

论阮玲玉自杀的社会意义赋予

刘长林 马磊磊

摘要：1935年3月8日，著名女影星阮玲玉自杀身亡，轰动社会。媒体迅速报道，引起一场大讨论。舆论从将其自杀归于个人的恩怨情仇，到说她是被封建主义毒害、被黑暗社会制度压迫而死，批判对象由个人延伸到社会，烘托出她被杀的弱者形象；同时，又说她是为妇女解放而牺牲，将她塑造成具有献身精神的新女性。对于预防自杀途径的探讨，舆论认为不但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而且要注重人际交流还有行业协会的建立及彻底的社会改造等。其自杀被演绎成具有丰富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成为社会舆论言说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等宏大时代主题的契机与符号。

关键词：阮玲玉；自杀；社会意义；赋予；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K825.78；J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5-0124-07

作者简介：刘长林，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马磊磊，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1935年3月8日，电影表演艺术家阮玲玉自杀，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纷纷评说其自杀反映的社会问题，蕴含的社会意义。以往对于阮玲玉自杀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其表演艺术、自杀原因、遗书真伪^①，而对于阮玲玉自杀所引起的社会反应，以及当时社会舆论如何看待阮玲玉自杀，研究不够。本文试图从阮玲玉自杀之后的报道、讨论等入手，对人们如何建构阮玲玉自杀的社会价值与意义，及当时社会舆论的话语结构与话语策略，试作初步探讨。

一、自杀原因探析：从个人批判到社会批判

阮玲玉1926年从影至1935年，成为市民大众喜爱的著名电影女明星，其自杀自然引起传媒广泛关注，一时之间“各报函电纷传，国人交相叹惜”^②。如时人所说：“这暗示了多少社会意义，行将成为上海的报纸产生一场热闹的讨论，那是无容置辩的。”^③媒体主动承载、激扬大众舆论，紧扣自杀意图的揣测，撩开社会讨论的大幕。

由于事出突然，媒体开始侧重事件的报道及自杀的具体原因，舆论集中在与其自杀直接相关的张达民身上，称电影明星阮玲玉“最近被前夫张达民所控告，刺激甚深，乃于昨晨三时许，突起厌世之心”^④。有的以“阮玲玉殉讼”^⑤的大标题报道。张达民控告“阮玲玉侵占与伪造文书

收稿日期：2009-12-05

① 如于继增《一代影星阮玲玉遗书之谜》，《文史精华》2006年第5期等。

② 《“人言可畏”，阮玲玉自杀之一因》，《大公报》1935年3月12日。

③ 金满成：《阮玲玉太可惜了》，《中华日报》1935年3月12日。

④ 《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申报》1935年3月9日。

⑤ 《阮玲玉殉讼》，《时报》1935年3月9日。

两罪”^①，阮玲玉于开庭审理的前一天自杀，报道自然与诉讼案联系起来。阮玲玉的两封遗书也针对张达民：“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不论，就拿我和他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唯一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不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阮玲玉绝笔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晚。（续笔）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的愿，你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看你怎样逃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以（已）经害死了我啊！”^②透露出以自杀向张达民抗议的意义。报道与遗书形成相互印证关系。

由于传媒提供的参考框架能影响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各种针对张达民个人批判式的报道引来人们对张达民的声讨。唐瑜痛骂张达民：“一个无赖，他是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不问他自己曾否和阮玲玉有否婚约，不想自己已经领到她二千四百元的脱离后‘赡养费’，仍厚着脸皮告人通奸。”^③一些女学生说“她的死，完全是张达民害的，张达民真该雷轰雷劈，才能给阮玲玉报仇雪恨”^④。“阮玲玉的自杀，一般人都将责任推到张达民身上去。”^⑤

而媒体试图挖掘更深层的原因，引导舆论的展开。因张织云与唐季珊有过恋情，传说因阮玲玉导致彼此恋情的破裂。记者采访张织云，张说：“外间或认为阮女士为余之情敌，此实错误，以余之心坎中，确无此印象也，余于阮之死，亦不欲有何批评，但为中国妇女缺乏真实学问，致其悲痛耳。大概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之故，意志比较薄弱，每在遭受痛苦时，易为错觉支配。”“至于唐季珊之为人，在余未发生意见之前，颇能相爱，但爱情未能专一，此殆为一般男子之通病，或不独咎唐君。”^⑥但报道冠却以醒目标题^⑦，舆论批判转向唐季珊，女性言辞更为激烈：“一个富商，尤其是置女性于股掌之间的富商，无论怎样的女子，纵逃不出这层恶势力的魔障，张织云不是一个吗？”“杀害了阮玲玉的罪魁是这诱惑女性，玩弄女性，蹂躏女性的唐季珊啊！”^⑧“一个女伶、女明星的出世，以及在社会上名声地位的造成，都非这批寄生虫的扶掖及捧场不可。而历来女子伶人及现代女子影剧家的悲剧，大半起因于此。”^⑨批判目标导向唐季珊为代表的富人，将他看成杀害阮玲玉的帮凶。

唐季珊成为众矢之的，有人提供唐季珊虐待阮玲玉的“管束太严，不得自由”，“完全把阮玲玉当做一个泄欲的工具”的罪证^⑩。唐季珊在阮玲玉的葬礼上试图澄清：“阮女士与本人之结合，决非因追求奢侈生活。”^⑪但无法左右舆论，明星公司声明，绝不以公司的名义参加唐季珊主持阮玲玉的丧事，“因唐为电影界之罪人，致阮于死之导火线”^⑫。唐季珊与张达民被建构成杀害阮玲玉的角色：“阮玲玉的悲剧，唐张二人是脱不了干系的。”^⑬

媒体希望讨论在更广阔的层面深入展开。《铁报》在《申报》刊登广告说：“敝报认为阮玲

① 《阮玲玉案子明日开审》，《申报》1935年3月8日。

② 《阮玲玉含冤以死》，《申报》1935年3月10日。1935年4月26日《思明商学报》刊载另两封遗书。两遗书真伪问题早有争论。侯艳兴认为，《思明商学报》的遗书不可能是真的，参见《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154页。

③ 唐瑜：《悼阮玲玉》，《中华日报》1935年3月11日。

④ 《中华日报》1935年3月14日。

⑤ 黎守愚：《谁杀害了阮玲玉》，《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⑥ 《一个觉悟的前辈》，《时报》1935年3月11日。

⑦ 《张织云谈阮玲玉之死，唐季珊用情不专》，《大美晚报》1935年3月11日。

⑧ 华静：《谁杀害了阮玲玉》，《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⑨ 明：《如何解脱社会的压迫》，《时事新报》1935年3月12日。

⑩ 《读者来信报告唐季珊虐待阮玲玉之种种》，载《影戏年鉴》，上海电声周刊社1935年版，第24页。

⑪ 《阮玲玉昨日入殓灵柩定后日举殡》，《时事新报》1935年3月12日。

⑫ 《明星公司未参加执拂之原因》，载《影戏年鉴》，上海电声周刊社1935年版，第25页。

⑬ 《阮玲玉自杀后之一般舆论》，《大美晚报》1935年3月13日。

玉之死，乃一严重社会问题，为特公开征求社会舆论。关于阮玲玉之死，究为社会所杀耶，为唐季珊所杀耶，为张达民所杀耶，为阮玲玉女士自杀耶，凡属读者皆可投稿。”^①《中华日报》一则征求读者意见通知：“我们觉得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讨论谁杀害了阮玲玉是必要的。这一问题，我们是希望着读者们能够迫制一下自己奔腾着的情感，冷静地思考一下，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谁是元凶，谁是帮凶，尽量地写出你们的意见。”^②

这时，舆论也开始对阮玲玉本身进行反思。在一般人看来，“阮之自杀，不外乎婚姻问题之牵累”^③，虽然称她“烈女性”，也将其死归于“红颜薄命”^④，女人命苦。一些固守传统贞洁观者，认为阮玲玉自杀是不守妇德的必然结果，“阮在女明星中，夙以风骚擅长，似属杨花水性女子”^⑤，她“如果从了张达民之后，不和唐季珊发生关系，不和张达民脱离（关系），当然不致被张所告，不被张告，自然也不必怕什么人言”^⑥。站在维护妇德的立场上，宣扬“不管恋爱自由进步到何种程度，趁着孝堂做亲的丈夫出门的时候，便姘了他的朋友而实行同居，难以认为是种正式的勾当吧。……阮玲玉（除了她的艺术上功绩）是一个死不足惜的女性”^⑦。因此“阮玲玉的死是自己促成的，奔放狂纵送了她的性命，享乐奢靡埋没了她的灵魂”^⑧。“间接使她送命的，还是‘黄金’和‘虚荣’，假使她当初不嫁给张达民，不会死；后来不改嫁唐季珊，更不会死”^⑨，批判时人倡导的爱情，认为“新女性”追求的爱情，其实就是虚荣。

有人则究根溯源，说阮玲玉不能超脱享乐的诱惑，坠入物质生活的牢笼，是“不正确的意识杀害了自己”^⑩。她“一个觉醒的或半觉醒的灵魂”，“脑子里的封建残余是很有力的，”^⑪不是进步的新女性。王尘无则说阮玲玉的生活和思想，是完全资本主义的，不能在这种半资本半封建社会立足了^⑫。阮玲玉作为“小有产阶级的女性”^⑬，她的意志与生活存在巨大矛盾。旭东说：“这种矛盾实际是一种精神生活向上和物质生活向上的矛盾，她不能在这矛盾中求得适当的解决，即是说她不能脱离这矛盾的苦痛，她不能勇敢的牺牲个人的享乐而献身于伟大的前途，于是她怯懦的自杀了。”^⑭否定阮玲玉自杀行为的可取性，进而质疑阮玲玉的进步性，以阶级分析的话语，将阮玲玉定性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女性。

这样，自杀就“不仅是单纯的阮玲玉个人问题，不仅是单纯的个人自杀问题，不仅是单纯的妇女问题”^⑮，而是全社会的问题。阮玲玉说的“人言可畏”，将新闻界置于批判的风口浪尖。“当阮、唐、张的诉事发生以后，有多少报纸上，用着各种引人注意的字符，油滑的评语，标题这事件，以博得观众的欢迎，增加报纸的销路。因此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发生许多漫骂、批评、讥讽，而使艺人多感神经，受一个极大的刺激，而至恐惧、悲痛、自杀。”^⑯记者补牢主张报章应该“慎用舆论权威”，告诫报界“不要仅仅为了满足你们的卑劣的欲望（如迎合低级趣味以推广销路等等）而不惜违反神圣的记者道”^⑰。另有记者主张“新闻制度，应该来一个大变革，

① 《申报》1935年3月10日。

② 《谁杀害了阮玲玉征求读者意见》，《中华日报》1935年3月13日。

③ 《从阮玲玉自杀说到道德堕落》，《民间周报》1935年第103期。

④ 《挽阮玲玉联》，《电声》第4卷第12期。

⑤ 《阮玲玉自杀后之一般舆论》，《大美晚报》1935年3月13日。

⑥ 沈约明：《阮玲玉自造悲剧》，《电声》第4卷第12期。

⑦ 陈浩：《阮唐张三人均有不足》，《电声》第4卷第12期。

⑧ 宣文傑：《谁杀害了阮玲玉》，《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⑨ 《阮玲玉自杀》，《社会日报》1935年3月11日。

⑩ 赵华：《不正确的意识杀害了自己》，《中华日报》1935年3月21日。

⑪ 聂绀弩：《阮玲玉的短见》，载《蛇与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10页。

⑫ 尘无：《悼阮玲玉先生》，《中华日报》1935年3月11日。

⑬⑭ 何可人：《阮玲玉哀史》，育新书局1935年版，第39页。

⑮ 旭东：《创立阮玲玉演技奖金倡议》，《申报》1935年3月19日。

⑯ 金君敏：《阮玲玉女士自杀之检讨》，《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⑰ 补牢：《慎用舆论权威》，《大美晚报》1935年3月14日。

使它走上真实为社会人群服务，负起指导社会走上正轨的任务”^①。鲁迅也为阮玲玉伸张正义，“现在的报章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决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于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② 他批评民众的看客心理、窥视女性的癖好，理解女性的受辱状态，对阮玲玉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论者陆续展开对于整个社会的激烈批判，说“买办、市侩、律师、黄色新闻……他们相互结合而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内容，这社会就是杀害了阮玲玉的凶手”^③！抨击社会背后的话语策略，是发泄对于现实的不满与愤恨，启迪民众奋起反抗黑暗社会的剥削压迫。

阮玲玉是自杀者，而自杀往往被社会所否定。杜重远认为“自杀是弱者的表现，阮玲玉的自杀只是表现了自己的怯懦”^④。但一些论者不认同阮玲玉死于怯懦，于是出现建构被杀的话语倾向。海若直言：“世界上并没有自杀的人，归根到底自杀者莫不是被杀者”^⑤。“阮玲玉女士的死，不是自杀，分明是被杀的！手枪也许是张达民的诉讼，和唐季珊的欺骗；然而动手放的真正刽子手，却是这古老的中国的封建社会。”^⑥ 是被“黑暗的，畸形的，矛盾的，罪恶的现社会”所杀^⑦。“被杀”的话语建构策略，使自杀归于民国的罪恶社会，推动舆论导向社会批判，揭示自杀事件所反映的社会弊端。如批判国民党当局提倡的尊孔读经，“这种古风的盛世，当然容不下再嫁的阮玲玉”^⑧，“已经死去了的封建僵尸又在复活起来，而且尽情的发挥着底下腐朽的气氛，阮玲玉之死就是在这一条件之下被牺牲了的”^⑨。“坟墓里挖出的封建主义的男权，以欺压弱小的女人，女人无处可逃”^⑩，批判现行制度无法保证女性的根本权益，只是男性压迫女性的工具。

在社会批判的宏大话语里，他们认定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毒害、黑暗社会的逼迫、现实制度的缺陷导致了阮玲玉的死亡。纪念阮玲玉女士，就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彻底的扫除这封建势力和黑暗社会”^⑪。通过阮玲玉“被杀”的话语建构，使之成为反对尊孔复古逆流、抨击民国当局的借口，促使人们将反对目标转向现实社会因素。社会舆论从个人批判向社会批判的延伸，超出个体死亡的悲剧事实，赋予了自杀事件广阔的社会意义。阮玲玉自杀“被称为近世十大社会新闻之一”^⑫，与当时社会舆论广泛关注不无关系。

二、新女性建构：呼唤受压迫女性求解放

20世纪30年代，具有左翼倾向的文艺工作者，将“新女性”形象搬上银幕，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等电影，便是在这一领域的实践。但银幕女性形象并未获得左翼阵营的一片喝彩，王尘无曾严厉批评没有新女性的角色呈现^⑬。但观众却通过电影角色的欣赏，将“新女性”标签赋予阮玲玉。影迷断言阮玲玉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处于领导妇女提高妇女地位、伸张女权

① 《代评阮玲玉与张达民诉案之新闻记者态度》，《中华日报》1935年3月14日。

② 鲁迅（笔名赵令仪）：《论人言可畏》，《太白》第2卷第5期，1935年5月20日。

③ 谢影笑：《关于谁杀害了阮玲玉》，《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④ 杜重远：《悼阮玲玉》，《新生》第2卷8期，1935年3月。

⑤ 海若：《谁杀害了阮玲玉》，《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⑥ 影坛同人：《悼阮玲玉女士》，《民报》1935年3月11日。

⑦ 杜宇：《悼阮玲玉女士》，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8页。

⑧ 漫灰：《阮玲玉的自杀》，《时事新报》1935年3月11日。

⑨ 向英：《阮玲玉死在封建余孽之下》，《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⑩ 白石：《悼阮玲玉》，《申报》1935年3月10日。

⑪ 陶星仲：《纪念阮玲玉女士的真意义》，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民国二十四年，联华影业公司编，第67页。

⑫ 参见史鹏《近世中国十大社会新闻》，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⑬ 尘无：《关于〈新女性〉的影片、批评及其他》，《中华日报》1935年3月2日。

的宣传者，负着重大使命的电影明星”^①。“全都是改正社会上荒诞的传统的意识，替劳动阶级起共鸣”^②，社会真正期盼的并不是软弱的女性，而是“应该与恶环境奋斗到底”的女性，于是她努力在银幕表现中，“把现阶段社会中女性之痛苦和弱点，充分显示出来，现身说法来警醒一般的女性”，但最终她“仍旧屈服于恶劣社会下，做了过渡时代的女性牺牲者”^③，因为压迫而不能反抗环境而一死了之。将银幕形象与真实的阮玲玉混为一谈，将她对于封建制度的批判、妇女解放的希望描述成阮玲玉的自我认知，将理想中为国家、社会前途的新女性形象赋予阮玲玉，在为国为民的话语塑造下，其女性形象呈现出光辉的色彩。

建构阮玲玉的新女性形象，是为了让女性认识到妇女境遇的悲惨和斗争的重要，呼唤受压迫的女性求解放。黎瑛指出是“万恶的半封建荼毒下的社会，资本主义糜烂下的世界”，“男性的世界”杀害了阮玲玉^④。“吾辈不幸而生此恶浊之世，尤不幸而生柔弱之女子，因乎贫困，迫于环境为图生而奋斗。”^⑤赵清阁呼吁：“看！前面敌对着的凶手，报复呀，姐妹们！奋起勇敢的精神，掏出真挚的热情，要施救未来许多的继续被牺牲，要安慰这位用自杀求解放的女性！”^⑥“我们女子，我们要为已牺牲的女性报仇，……这样阮玲玉的牺牲才不冤枉。”^⑦在妇女解放话语里，阮玲玉成为女性群体受压迫的象征，黑暗社会迫害下的牺牲者。

阮玲玉生前联华影业公司同人也积极塑造她的新女性形象。黎民伟说：“阮玲玉决不是这样糊涂的一个人，她的逃世，不是为了解脱自己，而是一个可怜女子，一个弱者，对于社会上无情的压迫，作一个消极的最后表示。”罗明佑甚至说阮玲玉之死为“妇女受压迫之最高表示”，“以阮女士之天才、地位、酬报，在我国妇女界已少观，但犹不免因被压迫而死，其他妇女之痛苦更可相见”。评价阮玲玉一生是“斗争的一生”，“灿烂光荣之一生”。“阮适于妇女节自杀，绝非一般自杀可比，实为妇女解放及社会正义而呼喊，自有其意义，人生原为服务社会而生，非自私自利而生，阮玲玉之死，并非自杀，实为社会及妇女而牺牲者。”在他们看来，阮玲玉是在封建社会制度之下，感到女子永远不能翻身，不能挽救自己，不能改善社会，也不能拯救在水火之中的女同胞，她要以自己的牺牲“向社会要求正义，向社会要求女子的平等，自由！”^⑧

媒体两次发表的遗书，均找不到阮玲玉为妇女大众的慷慨陈词，而仅仅是对张达民、唐季珊的个人指责和不堪舆论压力的哀叹。而女性同胞的愤怒声讨，强调的是责任与义务，主要论说的是阮玲玉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联华同人高调评价阮玲玉，提升阮玲玉自杀的意义，说她是为妇女解放而毅然献身的新一代女性，是因为“向黑暗的社会进攻”^⑨的女性形象符合要求反抗、变革的时代主流。这些妇女解放话语，是20世纪30年代，由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执政当局实施反动政策，引发民众抗争、要求革命意识的反映。阮玲玉自杀本来只是追求个人生活的正义，经过舆论言说，成为应在社会层面达到的正义。这一自杀事件成了时人特别是妇女表达社会意愿、要求解放的象征性符号。

三、防止自杀途径：从端正人生观到社会改造

在追悼阮玲玉时，时人认识到“阮玲玉女士之死，决非区区联华公司一家之损失，而系中国艺术文化重大损失”^⑩。“不特是中国影界的大损失，亦是吾国妇女界大不幸！”^⑪阮玲玉并非

① 华静：《谁杀害了阮玲玉》，《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② 陈叔荣：《纪念阮玲玉》，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37页。

③ 李萍雷：《悼阮玲玉女士》，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3页。

④ 黎瑛：《悼阮玲玉女士》，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6页。

⑤ 梁赛珍：《悼阮玲玉姊》，《时报》1935年3月11日。

⑥ 赵清阁：《悼阮玲玉女士》，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4页。

⑦⑧ 陶懿：《新女性中的消息》，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41页。

⑨⑩ 羊丁：《埋玉记》，《联华画报》第五卷第七期，“阮玲玉女士纪念专号”，第22—24页。

⑪ 兰影：《悼阮玲玉女士》，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2页。

民国时期自杀的首位女明星，之前已有毛剑佩、艾霞相继自杀身亡。电影演员相继自杀，引起人们深刻反省，“为了中国电影今后之成长，不能不尽力的将这不良的风气遏止下去”^①。“这类悲剧，是仍旧每天在这社会上继续地上演着，阮玲玉，不过是因为她的出名，而为社会人士所注意，叹惜，许许多多的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悲剧，将如何去阻止它呢？”^②

对于预防自杀的途径，人们认为首先应从个人改造做起，“实有改变生活态度的必要”，应该稍带一些革命的态度。“现代妇人所以脱不了男子的玩弄，一大半由于女子的生活太不坚实，安适淫靡的小布尔生活。其实不一定是怎样的绝对快乐。艺术的园地早已大开了，应该起来冲破束缚，而为自己打出一条出路。”^③要求女艺人改造人生观，认为自杀“终是弱者的态度，既有这种坚决意志，应该与恶环境奋斗到底，应该把她影片中代表弱女性奋斗的精神拿出来，应付一切才是”^④。“每一个新的影人，每一个新的女性，是要很直接地负责于伟大的明朝的。我希望大家一致的觉醒。”^⑤怎样才能真正的觉醒？旭东说“电影演员更应当，从这一惨变中觉醒过来，深切的认识现实，更正确地认识历史决定意义的前途。然后将自己的认识和信心，通过电影艺术发扬光大。同时将个人生活极力单纯化、朴素化、科学化，以毕生精力从事艺术的奋斗”^⑥。他勾勒出理想化的生活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境界，仿佛只要全身心投入到艺术之中，包括自杀在内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具有一种激进、反抗、奋斗精神的人生观，可以作为女影星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点。“为了促进中国电影演员们演艺的努力和生活修养的健康，为了减绝悲观的风气”，旭东倡议创立阮玲玉演技奖金给予“真正努力与电影艺术的人们”以“光荣的鼓励”^⑦。

旭东的说法和倡议虽然对预防自杀有益处，但自杀更多是由于在生活中，在处理人际关系中，遇到了难于处理的问题。所以一些论者希望“电影从业员各自洁身自爱”^⑧，是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对于这个问题，女影星张织云在谈到曾有自杀之念，后接受任矜莘劝告乃知挣扎奋斗时，说“去年五月以前，余若不遇任先生，或遇任先生，而不接受劝告，立志奋斗，亦颇有自杀可能……倘阮女士，亦能有人于事前向之解脱，或不致自杀，于此可知古人慎交之说之价值，与良师益友之重要”^⑨。她说明了交友和沟通对预防自杀的重要性。而阮玲玉的生活中，唯独缺少良师益友般的心理危机干预，费穆深有同感：“联华的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艺友’的关系而不是朋友，这是一个特点，同时也是缺点。特别是女演员，往往不拍戏就没有见面的机会。阮的私人生活和她的痛苦是不容易被人知道的。阮的讼事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同事替她策划应付。这件事，我们至今引以为憾。”^⑩

这样，人们探讨如何将工作的团体，组成为朋友式的团体，成为生活的港湾，从而远离自杀。凌鹤说：“电影从业员，彼此都独立在黑暗中摸索。相互之间，不相闻问。”^⑪中国电影界缺少组织、活动与交流，女影星在遭遇思想困惑、生活苦恼、感觉自己无助时，找不到精神支持，得不到鼓舞，往往孤立无援，难免陷入自杀泥潭，以至于悲剧丛生。旭东、凌鹤等人倡议创立阮玲玉演技奖金，加强电影界组织的活动及交流联系，试图使电影界加强凝聚力，以此激励电影演员为艺术贡献力量，从而减少自杀事件的发生，这与迪尔凯姆所推崇的建立行会等职业团体以预防自杀的情形极为相似^⑫。“在一个有凝聚力和生气勃勃的社会里，彼此不断交流思想和感情，如同一种相互的精神支援，这种精神支持使得个人不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是分享集体的力

①⑥⑦ 旭东：《创立阮玲玉演技奖金倡议》，《申报》1935年3月19日。

② 《吊艺人阮玲玉女士之死》，《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③ 明：《如何解脱社会的压迫——悼阮玲玉女士》，《时事新报》1935年3月12日。

④ 李萍雷：《悼阮玲玉女士》，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3页。

⑤ 《联华画报》，第七卷第五期，“阮玲玉女士逝世周年纪念号”，第8页。

⑧ 伯坚：《阮玲玉与中国电影艺术》，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50页。

⑨ 《一个觉悟的前辈》，《时报》1935年3月11日。

⑩ 费穆：《阮玲玉女士之死》，《联华画报》第7卷第5期。

⑪ 凌鹤：《关于阮玲玉演技奖金之创立》，《申报》（电影专刊）1935年3月26日。

⑫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29—430页。

量并在他自己的力量到了极限时从中得到鼓舞”，从而减少自杀的发生，反之“个人所属的群体越是虚弱，他就越是不依靠群体，因而越是只依靠他自己”^①，则会增加自杀的概率。

由于将阮玲玉之死归于宏大因素，向英认为“阮玲玉是恰称地象征了目前的中国社会，她的死并不是我们中国的出路”^②。“社会问题不根本解决，难有部分的改造”^③，主张“根本改造来扼止自杀的狂流”^④。杜重远认为“与其以自杀和毁灭来对社会抗争，为什么不以这种伟大的勇气，来参加现社会的改造呢？”^⑤“我们目前这个万恶的社会，正需要我们去加以改造”^⑥。更有人提出“生者应将如何努力，尤其应以改革社会为职志”^⑦。金君敏提出：“（1）全国的舆论界一致痛击利用金钱摧毁艺人的市侩。（2）纠正不正确的舆论禁止一切以无聊文字耀人耳目的报纸。（3）注意灌输艺人以知识，使其思想正确，见识高超，理智坚定。”^⑧

女性们从自杀惨剧中认识到：“妇女的解放，从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曾经一遍一遍的酝酿，但始终没有成功。”于是向女性同胞呐喊着“劝你们切勿自杀，来把这自杀的勇气，向这些无耻的男人不公平的社会来一个总攻击吧！”“女性们起来吧！来和这些专门攻打女性的恶魔奋斗！”^⑨“这些畸形的不合理的现状，不久就要过去、战胜了阴恶的环境，消灭了种种流毒，人类是有前途的！同志们！自觉吧！阮氏自杀的事已经痛切的教训了我们：生活是决不能委曲求全的了，自由是非彻底争取不得的！那么团结起来，努力啊！”^⑩“总该努力地向社会进攻。”^⑪妇女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求得问题的完全解决，使女性远离自杀，从而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些说法具有革命时代的话语特征，强调斗争热情，颂扬牺牲精神，期盼女性抱着对国家、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为妇女解放、社会革命而奋斗。

综上所述，阮玲玉自杀引发的社会舆论，反映了民国社会不同阶层与群体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甚至政治立场、话语系统的差异。既有将其自杀归于个人层面的恩怨情仇，贪图享乐，不守妇道，又有归于社会层面的红颜薄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及男性压迫，而社会宏大因素成了重点批判对象，自杀建构成了被杀；虽有指责她自杀是太懦弱，但很多人却将她看成为妇女解放、社会正义而毅然献身的新一代女性代表。相比个人因素，人们寄希望于根本的社会改造，认为社会制度和秩序处于合理状态，才是预防、救济自杀的根本途径。这种由个人向社会的归因与推演，是近代以来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思潮的继续和现实表现。

（责任编辑：周小玲）

评审意见：论文角度新颖，视角独特，由小见大，是篇较好的社会文化史论文。作者从分析1935年3月媒体对著名女影星阮玲玉自杀身亡的报道入手，解读关于阮玲玉自杀大讨论的社会意义。资料收集全面，概括得当，并有社会史问题意识。全文层次分明，由个人到社会，层层递进，并评价了当时对于预防自杀途径的探讨。本文提出结论是阮玲玉自杀“被演绎成具有丰富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成为社会舆论言说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等宏大时代主题的契机与符号”。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并具有较强的理论说服力。

评审专家：邵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法]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第215—216页。

② 向英：《阮玲玉死在封建余孽之下》，《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③ 英襄：《在阮玲玉自杀以后的感想》，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60页。

④ 尘无：《悼阮玲玉先生》，《中华日报》1935年3月11日。

⑤ 杜重远：《悼阮玲玉》，《新生》第2卷8期，1935年3月。

⑥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⑦ 金君敏：《阮玲玉女士自杀之检讨》，《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⑧ 子思：《关于阮玲玉自杀的感想》，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52页。

⑨ 英襄：《在阮玲玉自杀以后的感想》，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60页。

⑩ 陶懿：《新女性中的消息》，载《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41页。

doesn't begin. The essay points out that the equality principl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share principl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nature is beyond human are theoretical basis of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The building of environmental virtue is of two dimensions, nature as object and nature as environment. When referring to the former, environment virtue means that human should respect, has pity on and care for nature; when referring to the latter, environment virtue means that human should hold sentiments of gratefulness, attachment and awesomenes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Equality principle; Share principle; Principle of nature beyond human

On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Endowed to Ruan Lingyu's Suicide

Liu Changlin, Ma Leilei (124)

Abstract: On March 8, 1935, the famous actress Ruan Lingyu committed suicide, which was a great shock to the society. The prompt report by the media caused a heated debate on the event. Some people attributed her suicide to the individual pains and sorrows, some held that she was oppressed and finally killed by the dark social system, that is feudalism. The target of the criticism soon extended from the personal factors to the social factors which made her image as the weak woman;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context of calling for the liberation of oppressed women, the critics considered that she sacrificed for women's liberation and therefore portrayed her as a dedicated new woman. In order to prevent suicide, the media deemed that not only the individual should have the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but also the public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ative associations, and radic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Ruan Lingyu's suicide was interpreted as a major event which was of immense social significance. It became a symbol of women's liber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other grand themes of the time, and provided the social media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ose issues.

Keywords: Ruan Lingyu; Suicide; Social significance; Endowment; Discourse analysis

A Study of the County-Division in Jiangsu during the Yongzheng Reign in Qing Dynasty

Fan Jimin (131)

Abstract: In 1724 (the second year of Yongzheng reign), a large scale of county-division (shengzhou xixian) was carried out within Suzhou, Songjiang and Changzhou prefectures, which became the most significant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 of Jiangnan counties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ax-collection and the merit system of officials, this reform was resulted from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ax-collection which had made the merit system unfair and unreasonable for officials in this region at that moment. Attempting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ompetence of local officials and the extremely high tax revenues supposed to be levied in this area, the practice of county-division primarily aimed at alleviating the local officials of the duties of tax-collection and other onerous affairs, instead of simply "sharing the burdens of taxes". Therefore, the tax quotas, the administrative workloads, the merit system of officials, and the area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were intimately related.

Keywords: Qing dynasty; Suzhou-Songjiang-Changzhou; County-division; Tax-collection; Merit system of officials

On Debates of Salesclerk's Identity as Worker or Merchant in Modern Shanghai's Mercantile Class Movement

Zhu Ying (143)

Abstract: It is a long debate about the salesclerk's identity as worker or merchant in the period of mercantile class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the Nationalist Party (Kuomintang) required salesclerk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ssociation of mercantile class which led to the struggle between salesmen and shop owners in the same association. Then the Nationalist Party asked salesclerks to leave the association of mercantile class and organize their own labor union of salesclerks, which belonged to the general labor union. However, the disputes between salesclerks and shop owners increased. Those associations of mercantile class in Shanghai and other cities required that salesclerks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merchants and ask them to rejoin in merchant associations. So the Nationalist Party decided that those salesclerks who had relation with the